

王雲五先生與中國圖書館事業

王振鵠

已故黨國元老王雲五先生在我國近代史中，是一位智慧超群並對國家社會有卓越貢獻的一代哲人。他以其九十二年的生命「在人間作一次極不平凡的壯遊，使他在文化、教育、學術、政治各方面之貢獻在世上留下深刻的跡印」(註一)，吾人分析其事業的成就，可說與他之熱愛讀書、熱愛圖書館事業有極大的關係。

雲五先生在二十歲開始，以兩年時間讀完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已經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件傳奇，而他在自述中說：「我在學校的時期很短，我在圖書館的時期卻很長；我不是職業的圖書館員，但我大半生消磨於圖書館的時間恐怕比一般職業圖書館員尤多；一個職業的圖書館員至多與一、二十所圖書館發生關係，而與我有關的圖書館至少有幾千所」(註二)。可見雲五先生淵博的學識大多來自圖書館，也因為他時時刻刻利用圖書館充實自己，引發了他對圖書館管理和圖書館事業的興趣。他對圖書館管理方法有許多發明，如他所創造的「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四角號碼檢字法」，以

及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圖書背後上加印該書分類號及作者號，以方便圖書館編目作業的做法，在在表現出他對圖書管理技術的重視。他雖非主管圖書館事務的教育行政人員，但對圖書館事業的倡導和圖書館的設立，卻一向熱心非常。

而他主持多年的商務印書館也出版了不少文庫與叢書，以低廉的代價發售給學校、機關、家庭，無異把圖書館普及各地，這也是雲五先生所講的：「由一個圖書館化身為無量數小圖書館」(註三)。雲五先生也知道參考書是圖書館的核心館藏，商務也印行了不少辭典、字典、百科全書、年鑑等工具書，使圖書館充實了研究資源。雲五先生曾於民國十七年，當國立中央圖書館開始計畫籌備時，應大學院之聘，擔任審查會主席，因之，他也可說是中央圖書館的催生者。而中央圖書館自民國二十二年籌設之後，屢經顛沛流離，終能完成「珍存漢簡唐鈔，宋刻明槧，使瓊環秘笈，得以歷劫不磨」之典藏國家文獻之重責，進而在遷臺後，又「從頭作起，粗備歐美典籍與東西圖」，使中央圖書館成爲今日的知識寶庫，並領導

各級圖書館共同推展我國圖書館事業，這不能不說是雲五先生的貢獻。茲逢雲五先生百年誕辰，筆者謹以圖書館從業人員的身分，略述雲五先生與我國圖書館事業和中央圖書館的關係，以示崇敬與紀念之意。

壹、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

一 成立私人圖書館以提倡讀書風氣

雲五先生自幼無緣接受正規教育，但他生性好學，無時無刻不利用工作餘暇勤於讀書。在他的「我的圖書館生活」一文中，曾指出他不時利用師長、親友的私人圖書館或藏書苦讀不輟。十八歲以後，因應聘爲上海一英文專校教員，加上自己譯文校稿，有了不錯的收入，自己也廣爲搜購中西典籍，奠定了他在大陸淪陷前總計不下八萬冊的私人圖書館之基礎。由於他青少年時代讀書的經驗，使他深感圖書館的重要，因之，雲五先生一生中曾成立兩大私立圖書館，並公開對民衆開放。這兩所私人圖書館就是民國十五年開放的上海東方圖書館與民國六十三年在臺北落成啟用的雲五圖書館。

東方圖書館的前身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附設的涵芬樓。商務印書館在清光緒二十三年（民前十五年）創業於上海，光緒二十八年增設編譯所，由張元濟（菊生）先生主持，張氏一方面延聘碩學專家及富有教育經驗的學者擔任編譯工作，一方面則肆志蒐集圖書，作為編譯者考證參考之用。所蒐集的圖書，則在光緒三十年成立涵芬樓存放典藏，以厚植商務編印圖書的基礎。張氏因蒐購圖書甚勤，涵芬樓到民國十五年左右，已有舊籍善本及一般參考書二十多萬冊，英日德法文五、六萬冊，其藏書共分八個部分：①舊籍；②教科書及教科參考書；③東方語文書；④英文及西方語文書；⑤日報、雜誌、章程；⑥地圖、掛圖、雜畫；⑦照片、明信片；⑧碑帖。足見其藏書之豐與範圍之廣，不僅為私家藏書之冠，較諸當時規模最大之公立圖書館亦不遜色。

民國十年，雲五先生繼高夢旦先生就任第三任編譯所所長，有鑑於涵芬樓蒐藏豐富，建議另建館舍供眾閱覽。經張菊生、高夢旦先生同意，乃在商務總廠對面建築一棟五層樓的館舍，民國十三年三月建築落成。商務即將涵芬樓藏書移存於此，並改名為東方圖書館，聘請雲五先生為兼任館長。十五年，東方圖書館館務籌劃就緒，適逢商務創業三十週年，乃於五月三日正式對外開放。因之，吾人可謂涵芬樓藏書為張菊生先生所蒐集，而雲五先生則致力其開放，以嘉惠民衆之促成者也。雲五先生在「東方圖書館概況序」中說明，他建議開放東

方圖書館的原因是鑑於自清末變法以來，國人雖已知圖書館為教育要務，然數十年間，國內圖書館之設置仍不敷數觀，公開者尤少，比諸歐美國家，生聚數百戶之村落莫不有公開之圖書館，仍差之遠矣，因之，他近察國內文化進步之遲滯，遠矚世界潮流之日新，乃建議公開涵芬樓之豐富典藏，以供社會民衆閱覽，並取名東方圖書館，聊示與西方並駕，發揚我國固有精神（註四）。可見雲五先生在當時已體認到圖書館之重要，因此一改涵芬樓之典藏性質而使之成為一所供公眾利用的圖書館，對當時正值起步階段的我國圖書館事業，實有振聳發聵之啟迪作用。

雲五先生主持東方圖書館之後，以涵芬樓藏書為基礎，繼續蒐覓圖書，當時商務所出版之圖書，每種均捐贈三部給東方圖書館以供閱覽流通；因此，當時凡古今中外各科學術上必需的參考書，無不大致粗備。而在閱覽管理方面，先生亦通盤規劃，民國二十年，東方圖書館成立流通部，辦理圖書借出館外閱讀事宜，這在當時國內實不多見；尤其是流通部更訂有通信借出辦法，公用借閱圖書不限於上海，尚可用郵遞方法，擴充至國內各大埠；這種郵遞方法，即使在今日國內，也尚未普遍推展（註五），可見雲五先生對圖書館的經營，已具有前瞻性和服務性的觀念。東方圖書館不幸在民國二十一年毀於日軍炮火，三十年蒐藏悉付焚如，實為我國文化浩劫。以後雲五先生雖力謀復館，然抗戰又起，商務數度播遷，復館計畫

因之擱置。抗戰末期，商務在重慶成立總管理處，財務狀況穩定，房舍規模稍具，雲五先生即成立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並設閱覽室，開放民衆閱覽，其規模雖不如過去，但當時重慶公共圖書館不多，因之，來館閱讀者座無虛席，頗為社會人士所稱道。

雲五先生主持東方圖書館，是他與圖書館界發生關係的開始，民國十七年，東方圖書館會舉辦圖書館講習班，各機關學校派員一百四十六人參加，雲五先生親自講授部分課程。由於兼長東方圖書館工作，雲五先生也開始參加全國性或地方性圖書館專業組織及活動，並先後擔任上海圖書館協會委員、委員長、中華圖書館協會執行長、上海市圖書館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臨時董事會副董事長等（註六），使他接觸圖書館工作的層面更為廣泛。

東方圖書館雖是私立圖書館，但財產仍屬商務印書館，真正由雲五先生個人捐獻成立的圖書館則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二日成立的雲五圖書館。

雲五先生自政府遷臺後，一度離開商務出任公職，他廉潔從政，服官十有五年，毫無積蓄，五十三年自政壇退休重返商務，擔任董事長職務，為當時業務已漸衰退的商務重振旗鼓，因經營得當，為公司盈利三、四千萬元（註七）。一己股利及勞苦報酬至民國六十一年積定捐出百餘萬元，配合自己藏書成立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供眾閱覽。六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雲五圖書館基金會召開第一次董事會，並訂定章程十條，其中第八條規定：「在本會創設人去世之後，董事會得經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票，對創設人續捐之基金，用以遷建館屋或推廣其效用，俟大陸光復時並得在各大城市分設圖書館，總以有助於文化教育之目標，惟無論如何，均不得將本財團法人解散或將圖書館取消。」（註八），可見雲五先生對這圖書館的重視。

經兩年的籌備，雲五圖書館於六十三年十月二日在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十九巷三號正式公告開放，其公告刊於報端，內容摘要如下：

「雲五性喜讀書，當然好聚書。在大陸四十餘年，先後聚書七萬餘冊……民國三十七年退出大陸時僅移出極小部分……遷臺以來，二十餘年仍不斷聚書，迄今又達三、四萬冊，中外雜誌不下百種，其中創刊至今無缺者五、六種，蟬聯至二十餘年完全無缺者數十種。現以年老衰病，除將全部圖書雜誌捐獻社會，公開閱覽外，並自捐新臺幣百餘萬元成立財團法人，旋又承商務印書館捐助四十萬元，諸同學合捐十餘萬元，現除自購房舍一幢外，尚存證券及現金共一百五十六萬元，其利息收入足供維持用人費用及日常開支，每年尚有可購新書之現款若干……」（註九）

雲五先生以畢生積蓄，成立一所私立圖書館，以嘉惠後學，鼓勵社會讀書風氣，其精神實令人敬佩，由於他的倡導，在社會上引起不

少迴響，許多私人圖書館紛紛成立，對圖書館事業的推展，有相當的助益。

二、發明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與四角號碼法，改進圖書管理技術

雲五先生主持東方圖書館時，為謀圖書館館藏之便於利用，非常重視圖書分類工作。當時東方圖書館所藏現代新書及外國文字圖書不在少數，因此涵芬樓所用的四角號碼勢必要改弦更張。當時國內圖書館界亦引進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但是杜威法以歐美文化為單位，較適合西文圖書分類，因此，各大圖書館多採用兩種不同的分類法作為整理中、西文圖書之依據。雲五先生認為中外學術本有相通之處，如因分類法的關係，而把性質相關或相同的書籍分別排列，這不祇是在參考上不方便，而且強把中西學術間劃一鴻溝，尤為不當。此外，由於中外圖書分別排列，使得一本西文書和其中譯本常遠置兩處，失去了圖書分類的意義。（註一〇）

雲五先生感於圖書分類的重要，乃參考國內外分類法，並研究美國克特氏的分類原理和理論，而在民國十六年創編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是以杜威分類法為藍本，而以雲五先生發明的三個符號「十」、「廿」、「十一」，將關於中國的書籍冠於與杜威氏原類相同者之前，而分別置於與其大同小異之西方圖書之最近距離處，於是不僅譯本與原本放在一起，而中國古籍與西方圖書性質盡同或大同小異者，無不分別置於相

同或相近的地位。（註十一）

有關雲五先生「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的內容及用法，可參見原著，茲不贅述。惟雲五先生發明此一分類法，係基於圖書館實務上之需求，可見其對圖書館工作的認真與執著，而其合併中西圖書分類為一體的理想，在六十年後的今日我國圖書館界，毋寧說仍是在追求的理想。「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雖然由於三種符號的運用均賴主觀判斷，易生困擾，且因學科分野日加細密，以致無法在今日廣為採用，但對當時的圖書管理技術確有相當的助益。而事實上，即使在今日，我國許多西文藏書不多的小型圖書館，實在沒有採用西文圖書分類法之必要，或許雲五先生這種中外統一的分類方法，仍是值得大家考慮的。

雲五先生在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五年間除研究圖書分類法之外，並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檢字法自十三年十一月開始研究，到十五年八月初步就緒，十七年十月始增訂完成（註十二），前後費時達四年之久。

雲五先生研究檢字法的動機依舊是為了管理圖書方便，他感於當時通用的部首檢字法同一部首中同筆畫的字太多，不易排列先後，加以部首的界限也極不分明，使人無從捉摸，因思對檢字方法加以改革（註十三）。民國十四年，雲五先生偶而由電報號碼書中得到靈感，希望從一個字的字形分解號推斷出一個字的代表號碼。他首先研究出按筆畫和筆法來對稱數字的「號碼檢字法」，但後來發現其缺點很多

，因此又針對號碼檢字法的缺失加以改進，把代表筆畫數目的號碼，用來代表筆畫的種類（筆形），其間經過了多次的變更，才決定把筆形分成十種，分別用零到九代表，每個字按照左上、右上、左下、右下角順序，取其筆形的代碼，組成四個號碼——這就是後來正式定名的「四角號碼檢字法」。這種方法的優點是不用部首，不計畫數，不論筆順，免除部首法產生的分辨不清的困擾；胡適先生曾為此筆形號碼撰一歌訣，使大家記憶方便：「一橫二垂三點捺，又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九是小，點下帶橫變零頭」——四角號碼檢字法推出後，全國各機關、學校、出版社及圖書館，採用者很多，成爲民國以來新發明的檢字法中，最成功的一種（註一四）。

雲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檢字法不僅用於解決東方圖書館著者號的排列，也用到其他書名片、著者片等的排列。當時國內許多圖書館亦紛紛引用，影響所及，許多工具書也直接用它來編排字序或間接地在書後加附四角號碼索引。因此，四角號碼檢字法數十年來一直成爲中學國文課本必教的補充教材；即使在今日電腦發達時代，中文輸入方法之一的三角編號亦係受到四角號碼的啟發而編訂，因此吾人不能不謂雲五先生這項發明之影響深遠。

「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和「四角號碼檢字法」是雲五先生參與圖書館工作的兩大發明，而這兩項發明雲五先生自謂「分類法賴檢字法而完成，檢字法亦賴分類法而磨練，二者互

有關係」，這不僅使得他所主持的東方圖書館在當時成爲一所管理完善的圖書館，而這兩項發明在我國圖書館事業史上亦是圖書分類編目方面的重大改革。

三以出版配合推展圖書館事業

雲五先生自民國十年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後，即與商務結下不解之緣，總計其先後在商務工作計達四十年之久。在他主持下的商務，不僅供應適合時需的學校教科書、工具書，復大量譯印世界學術名著，整理出版有價值的古籍，使商務出版數量之多，選擇之精均爲全國第一，因此雲五先生對出版事業，以至學術文化的貢獻，都是不容置疑的。喬衍楨教授曾說：「近五十年的中文出版事業，如果把雲老的成就剔除，便要黯然失色」（註十五），實在是客觀的評論。

而雲五先生從二十歲便感到圖書館的重要，他經營出版事業，亦深切體認圖書館與出版界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圖書館是出版界的主要供銷站，而出版界的盛衰，與圖書館事業的發達亦息息相關，因此他出長商務編譯所後，即思如何以出版事業來輔助圖書館事業之發展，蓋當時「國內圖書館運動盛起，而成績不多，究其故，一由於經費支絀，一由於人才缺乏；而相當圖書之難致，亦一其端也，以言舊籍，則精刻本爲值甚昂，縮印本或竟模糊不可卒讀。以言新舊，則種類既駁雜不純，系統亦殘闕難完備。因是，以數千元巨費設置一小規模之圖書館，而基本書籍往往猶多未備」（註十

六），這是雲五先生爲印行萬有文庫所揭發緣起的一段話，說明了當時新式圖書館事業雖然逐漸在我國發展，然各地興建圖書館仍不免糾於經費購買圖書，即使有一點經費，亦不知如何建置一部完善的館藏。

因之，雲五先生自入商務後，即籌議爲國內小圖書館植其根基，他的具體辦法就是從編印各種有系統的小叢書入手，以謀充實圖書館之內涵，自民國十一年到民國十六年，總計出版了五百多種各科小叢書，方便了圖書館有系統的採購。十五年，東方圖書館正式開放後，他也提出：「由一個圖書館化身爲無量數小圖書館」的口號，也就是想把整個大規模的圖書館的藏書，如何化身千百，分散到全國各地、各學校、各機關，甚至於各家庭，使各地方都能以極低廉的代價，創辦具體而微的圖書館，並使這些圖書館分類索引及其他管理工作簡化，減少人力及管理費用。

雲五先生想出來的方式，就是精挑細選商務及東方圖書館的各科優良圖書，將其有系統的組織、整理，然後再大量地出版、發行，分期供應給各圖書館。由於有系統地組織整理，將可免除各圖書館不知如何選書的困擾，也由於大量的出版發行，售價因之低微，各圖書館、機關、學校、家庭都可採購，可達到普及教育、文化之目的。

雲五先生這項計畫，就是編印「萬有文庫」，他先將歷年來已出版的各種小叢書存精去蕪，嚴定系統，其次，再選定國學基本叢書一

百種、世界名著若干種、參考巨籍若干種，計收圖書一千零十種（二千冊），共一億一千五百萬言，在民國十八年發行「萬有文庫」第一集，各省響應熱烈，預約即達八千部。民國二十三年，雲五先生又編印萬有文庫第二集，收書二千冊，共一億九千萬字，其特色為加重國學基本叢書與漢譯世界名著之數量，並以自然科學小叢書及現代問題叢書代替第一集之農、工、商、醫等小叢書，以提倡自然科學。

抗戰前一年，萬有文庫第一、二集均已全部出齊，憑藉這套萬有文庫而成立的圖書館有二千所以上，因此吾人不得不謂雲五先生在當時對我國圖書館的普及有極大的貢獻。

而萬有文庫編印的目的，除了採用最經濟之排印方法，使整個東方圖書館的圖書以低微的價格貢獻於社會，更在每本書上，加印中外圖書統一分類號碼，附送書名片，故購買該文庫而成立的小型圖書館，無需再加以分類或編目，即可排列上架，使各圖書館節省不少管理費用。這種作法，就是國際圖書館界所提倡的「出版品預行編目計畫」(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簡稱CIP)的先聲，這即使在今日，也尚未普遍實施，而雲五先生卻早在五十幾年前就已開始推行，可見其高瞻遠矚之處。而CIP實是出版界為便利圖書館的一種方式，亦足見雲五先生的出版計畫和出版事業，無不以輔助圖書館的發展為依歸。雲五先生這種以精選圖書而編印價格低廉叢書的方式，到臺灣後的商務印書館仍然繼續推行，如五十三

年開始的萬有文庫叢書，五十四年開始的「人文庫」、「各科研究叢書」，五十七年的「國學基本叢書」，五十八年的「古籍今註今譯」等等，皆是各級圖書館必備的藏書，而商務的「人人文庫」等亦保留印上中外圖書統一類型的類號和四角號碼的做法。此項做法雖因近年來採用中外圖書統一類型的圖書館較少而致效用減低，但商務在今日仍秉持著雲五先生出版大套書則為圖書館著想的觀念，如最近兩、三年，商務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即與中央圖書館合作，由該館將這套書以電腦作業編目，並供應全套目錄卡片，使購買這套巨大叢書的各圖書館不必為分類編目費神，這也可說是雲五先生的遺規罷！

雲五先生是以自學成功聞名的，而自學必多靠參考工具書，他在「我怎樣自修」(註十七)一文說他自修成功的方法有七點，第一點即是時時刻刻利用字典、詞典。商務印書館原先也重視出版工具書，如辭源、中國人名大辭典等皆是民國初年重要工具書，雲五先生入長商務後，亦廣續工具書的出版計畫，如辭源續編、教育大辭書、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法律大辭書等，據張錦郎先生統計，從民國十二年到二十七年，商務共出版新編工具書一百七十五種左右；二十八年以後，則還有圖書大辭典、歷代名人生卒年表、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等至今仍為圖書館參考室重要典藏的參考工具書(註十八)。商務遷臺後，也陸續出版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中正

科技大辭典等有名的專科辭典；雲五先生逝世後，也印行重編國語辭典、中華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等重要參考工具書；我們如果到國內大圖書館的參考室作一瀏覽，可看到商務所出版的圖書，佔了極大的份量，而參考工具書實為圖書館發揮研究功能的核心館藏，因此吾人亦可說這是雲五先生領導四十年的商務印書館對我國圖書館事業另一項具體之貢獻。

貳、與中央圖書館的關係

一、中央圖書館的催生者

民國十七年，大學院在首都召開全國教育會議，各部各省區代表及特聘專家共七十八人與會，其中所聘的圖書館專家一人即為王雲五先生(註十九)。會議中有分組審查委員會，第六組為出版物組，亦包括審查有關圖書館之議案，該組委員四人，以雲五先生為主席。該次會議關於圖書館之成立案有五：第一是籌備中央圖書館案；第二是請規定全國圖書館發展步驟大綱案；第三是大學院所擬建立的中央圖書館應迅速籌款購置國內外出版專門研究學術之各種雜誌及貴重圖書以供各地專門學者參考案；第四案是請大學院通令全國各學校均須設置圖書館，每年自經常費提出百分之五以上作為購買費；第五案則是提請大學院通令全國採用四角號碼。

此第一案即為王雲五先生所提議而成立的，其提案內容及辦法為(一)中央圖書館設於首都；(二)中央圖書館建築及設備費定為一百萬(王

雲五先生在大會時請大學院注意不足百萬或祇二十萬元時，亦不妨即辦；(三)請國民政府撥二五庫券或其他款項二百萬作為基金，以其利息供常年購書費及行政費；(四)中央圖書館依下列方法蒐集圖書：(1)全國出版物於呈請著作權註冊時除照著作權法規定繳呈部數外，應加繳兩部，由主管機關繳存於中央圖書館；(2)各公共機關之出版物，一律以其兩部繳存於中央圖書館；(3)一切公有之古本圖書，於可能範圍內收集之於中央圖書館；(4)徵集國內私人所藏佚本，規定獎譽辦法；(5)國際交換之出版品，一律繳存中央圖書館；(6)徵集國外學術團體出版物，以本圖書館影印佚本為交換；(7)向國外各大圖書館將我國流傳彼處之孤本攝影或鈔錄；(8)蒐購國內孤本與國外富有價值之圖書。(五)中央圖書館於館長、副館長以下設圖書、研究、出版三部，圖書部主本館藏書及公開閱覽事項；研究部主研究圖書管理法及訓練圖書館應用人才；出版部主印行孤本及編印各種目錄索引。

這個提案已為中央圖書館勾勒出未來中央圖書館成立的模型了；雲五先生在會議中並說明大學院應從速設立中央圖書館，並以該館負指導全國圖書館之責任，其理由是：「圖書館之有裨文化，不下於學校，而其效力之普遍，且有過之，現在國立大學已設有多所，而全國無一完備之國立圖書館，殊為遺憾。我國圖書館之不發達，實以缺少表率，為其重大原因，故未設圖書館者，不知如何辦法？每逡巡而不

前，即已設者，亦多囿於我國舊日藏書樓之習慣，不能充分達到現代圖書館之效用。現在大學院雖於文化事業處特設圖書館科，注意提倡，然與其徒事書面指導，何如以具體之模範示之，故中央圖書館有亟待設立之必要也，明知目前財政困難，建設匪易，然圖書館之設置，本非短時間可成，而此時已有亟須籌備之必要」(註二十)。

雲五先生的提議在這次會議中通過，民國二十二年，教育部派蔣復璁先生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國家圖書館於焉成立，故飲水思源，吾人實不能不感念雲五先生在全國教育會議中為中央圖書館積極催生，也為中央圖書館未來的經費、組織和職責都已事先預作規劃。

二 與中央圖書館的合作

中央圖書館成立後，雲五先生與中央圖書館曾有兩次合作機會。第一次是民國二十二年蔣復璁先生奉派籌備中央圖書館，當時經費有限，又值九一八事變之後，經費困窘，僅由交通部按月補助兩千元，其中一千元是購書費，但欲以此項預算大批購置圖書，尤其是昂貴的外文參考書，無異緣木求魚。故蔣先生乃面陳當時教育部長朱驥先先生，擬籌印四庫全書，做為和西方圖書館交換書籍之用，一方面亦藉此藝林盛事而不顯國家之守藏(註二十一)。此事雖經若干學術界人士多方阻撓，幸繼任的王雪艇部長全力支持，命蔣先生赴上海與出版界洽商。蔣復璁先生的影印計畫，雖已顧及印

費過鉅，故採取選印的方式，然當時正值二八之後，經濟凋敝，上海各大出版社如世界書局、中華書局皆不敢接受，只有當時任商務總經理的王雲五先生願全力促成此文化大事。據蔣復璁先生在「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註二十二)一文中記述：「……代表商務印書館的就是總經理王雲五先生，依我估計，民元就任大總統府秘書，至少已是五、六十歲人，那知是精神飽滿，鬚髮稍有花白，還不過四十許人，大出我意料之外。」此次蔣復璁先生和雲五先生的合作，選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罕傳之書二百三十一種，一千九百六十冊，名曰四庫珍本初集，終於在民國二十四年出版竣事，中央圖書館用這部書奠定了初期西文參考書的基礎，因為今日中央圖書館架上之西文參考書籍，甚多尚為當年用四庫交換所得，故雲五先生於中央圖書館藏建置亦為有功矣！而自民國十三年商務亟思影印四庫全書全集的計畫，亦終於在民國七十一年得以付諸實施矣。

雲五先生對中央圖書館另一項支援是由他任董事長的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贊助中央圖書館建築費十萬元。民國四十四年，中央圖書館遷入南海路舊址後，蔣復璁先生在數年內曾多次擴建館舍，後來他又在閱覽室後，造了五層書庫，在最高層書庫之前，即閱覽室屋頂之間添了一間善本閱覽室，用款十萬元——這十萬元即是由嘉新文化基金會所提供的，蔣復璁先生說：「這十萬元對當日的我而言，真是雪中送炭，價值有同千百萬元，因為完成了我

重建中央圖書館的心願」，又說：「這是雲五先生對我同情，也是以一個圖書館學專家的欣賞而由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獎助的」（註二十三）。這項支援，也可以說明雲五先生對中央圖書館的關切。

此外，雲五先生在民國六十四年先總統蔣公逝世後，亦曾提出將中央圖書館改為中正圖書館，並擴大編制，改為直隸總統府或直屬行政院，以強化國家圖書館的功能的建議（註二十四），並希望能夠仿照美國國會圖書館，建立著作人將出版品送到圖書館註冊編號，一方面取得版權，一方面使國家圖書館能徵集到所有國人的出版品。——這證明雲五先生在晚年仍關切中央圖書館的發展。

綜觀雲五先生的一生，從愛書、讀書，到利用圖書館、主持私人圖書館和出版事業，可謂與書結下不解之緣，而因一生與書接觸，使他亦重視圖書館的設立和管理，因此他雖非真正的圖書館專業科系出身，但他一生中所推動的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管理觀念、方法，以及一些對圖書館的扶助，實超過一般圖書館從業者，今日吾人紀念雲五先生百年誕辰之際，尤應感念他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不朽貢獻。

註釋

- 註一：見王雲五先生墓誌銘（載於王雲五先生哀思錄一書前頁）。
- 註二：見「我的圖書館生活」（載於王雲五著「談往事」，民國五十四年，傳記文學出版社）。

- 註三：見王雲五先生著「岫廬八十自述」第一一頁。
- 註四：參見王雲五「岫廬論學」第三三〇頁。民國五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印行。
- 註五：參見宋建成「岫廬先生與東方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三十一期。
- 註六：見張錦郎「王雲五與圖書館事業」圖書與圖書館一卷一期，第二九一—三〇頁。
- 註七：參見胡述兆「我所親炙的王雲五師」，傳記文學三十五卷第四期。
- 註八：見「財團法人臺北市雲五圖書館基金會章程」（載於「岫廬最後十年自述」，第六五八頁—六五九頁）。
- 註九：見「岫廬最後十年自述」，第八〇—八四頁。
- 註十：同註二。
- 註十一：參見王雲五著「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第九一—一〇頁，民國五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印行。
- 註十二：同註三，第八五頁。
- 註十三：同註三，第九一—九二頁。
- 註十四：同註六，第一八頁。
- 註十五：張義德「敬悼王雲五先生——兼勉出版界」，出版與研究，五十四期。
- 註十六：同註一。
- 註十七：同註四，第一四頁。
- 註十八：同註六，第二五頁。

註十九：參見楊家駱編「圖書年鑑」民國二十二年中之第三篇：「全國圖書館概況——南京地區」，第三十一頁。

註二十：同註一九，第三—三頁。

註二十一：參見蔣復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序」一文及「我與中央圖書館」一文（載於近代中國第十一期，中央圖書館館刊十六卷一期亦轉載）。

註二十二：蔣復璁「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傳記文學，三十五卷，第三期。

註二十三：同註二二。

註二十四：見陳祖華「效法 蔣公讀書報國，王雲五資政建議的兩項紀念構想」，聯合報，六十四年四月八日，第二版。

參考書目

- 一、王雲五著「談往事」，民國五十四年，傳記文學出版印行。
- 二、王雲五著「岫廬論學」，民國五十四年，大華晚報社印行。
- 三、王雲五著「十年苦鬥記」，民國五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印行。
- 四、王雲五著「岫廬八十自述」，民國五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印行。
- 五、王雲五著「岫廬最後十年自述」，民國六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印行。
- 六、王壽南編「王雲五先生哀思錄」，民國六十九年，商務印書館印行。